

金融危机后的世界经济秩序： 实力结构、规则体系与治理理念

徐秀军

内容提要 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冲击本身就意味着世界经济的失序及由此而进行的一系列调整,但很难说一场危机就能塑造一个全新的秩序。世界经济秩序的重塑与再造主要取决于经济实力结构、经济规则体系及经济治理理念等构成要素的发展变化。金融危机后,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之间及各自内部的经济实力出现双层分化,南北经济关系更加多元;世界各国尤其是大国围绕规则制定权的博弈日益激烈,但议题主导权的分散加速了世界经济去中心化进程;自由市场经济作为现存世界的核心发展与治理理念日渐式微。由此可见,世界经济秩序已进入一个深度调整 and 变化期,但从现实来看,实现世界经济秩序的根本性变革仍任重道远。

关键词 国际政治经济学 世界经济秩序 金融危机 国际规则 全球治理

一般来说,人们对世界经济秩序发展变化的认识往往有赖于一些标志性

* 徐秀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邮编:100732)

** 本文为笔者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未来十年金砖国家合作的发展趋势及影响因素研究”(项目编号:15BGJ051)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国际政治研究》匿名评审专家的建设性意见,文责自负。

的事件,这不仅是因为重大事件更容易吸引人们的关注,更是因为重大事件往往引起程度很大的量变甚至是质变。金融危机就是这样的事件,它之于世界经济秩序的意义不言而喻。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冲击本身就意味着世界经济的失序及由此而进行的一系列调整,从而能够引起人们对原来的秩序的反思,并以这一“非常态”为起点,推动世界经济秩序向着新的“常态”发展。但是,很难说一场金融危机就能重塑一个新的秩序,因为世界经济秩序有其构成要素,并且发展演进有其自身的逻辑,忽视或者夸大金融危机对于世界经济秩序的影响都不可取。那么,金融危机后的世界经济秩序有无改变,或者进一步说在多大程度和范围上发生了改变,这些改变将给未来世界带来怎样的影响?在界定世界经济秩序的基础上对其内部要素进行解构,并结合世界经济发展的现状和趋势来剖析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秩序的演进方向。

一、如何理解世界经济秩序

近年来,学界关于世界经济秩序的讨论日益深入,但迄今为止人们对这一概念的认识仍不尽相同,很多相关研究都是建立在较为宽泛或含糊的界定基础之上。究其原因,一方面,由于世界范围内的经济与政治因素高度联动,不可能存在脱离政治秩序而独立运行的经济秩序,因此从世界秩序中剥离出世界经济秩序本身就是一件十分棘手的事情;另一方面,由于世界秩序在本质上是一个富有争议性的概念,因此要对世界经济秩序的界定形成共识也几乎不可能。但可以肯定的是,理解世界经济秩序需建立在充分认识世界秩序的基础上。

关于世界秩序,丹麦学者格奥尔格·索伦森(Georg Sørensen) 将其归纳为四个维度:一是关注有关战争的政治军事平衡;二是关注国际机制的建立及全球治理的兴起;三是关注观念和意识形态领域,尤其注重全球范围内共同价值观的形成或消失;四是关注经济领域的生产、金融和分配。^①从构成世界的行为体来看,这些不同维度分析的本质区别来自对国家在世界秩序中所占据不同地位的认识。对国家中心主义者而言,国际秩序或国家间的秩序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世界秩序。由此,无政府状态与权力制衡便成为其中最为重要的

^① Georg Sørensen, "What Kind of World Order?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in the New Millennium,"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Vol. 41, No. 4, 2006, pp. 343-363.

要素。^① 对于社会中心主义者而言,世界秩序指的是支撑整个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或主要目标的人类活动的格局或布局,它不仅包括国家间秩序,还包括国家内部的国内秩序,以及涵盖国家体系的世界政治体系秩序。^② 此外,还有一种检视世界秩序的两分法。它将世界秩序的含义划分为分析和描述层面的秩序,以及价值和规范层面的秩序,前者揭示秩序的非随机特点,后者将秩序视为一种稳定、没有暴力冲突的状态。^③ 这些研究将世界秩序通常描述的是一种状态,但从较长的历史时段来看,世界秩序则表现为一个动态概念,因此对其理解不应一成不变。冷战结束后,掣肘东西方国家交流与整合的政治限制瞬间打破,全球相互依赖由此迈入新的历史阶段。在这一进程中,国际规则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全球化朝着以规则为基础的方向发展,很多学者日益强调规则在世界秩序的核心作用。例如,基辛格从现实角度将世界秩序与各种制度安排的公正性及权力的分配联系起来,认为世界秩序的基础包含以下两个要素:一是一套共同接受的规则,用来界定允许采取的行动的范围;二是权力制衡,用来在规则破坏时实施限制,以防止某一个政治单元实现对所有其他者的征服。^④ 尽管学界认识不一,但综合来看,世界秩序总体上表现为权力(实力)、制度和观念有机组合而成的整体。

作为世界秩序的一个组成部分,世界经济秩序除了拥有世界秩序的一般内涵和特征外,也必然有其个性要素。对于当今世界经济秩序构成要素的全面认识,有赖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学术和政策层面关于世界经济秩序的三次大的讨论。第一次在 20 世纪 70 年代,其背景是以“77 国集团”成员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推动联合国通过《关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宣言》的决议,号召对大部分国际贸易规则进行改革,增加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灵活性,重新定位国际援助与合作机制等。^⑤ 第二次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其背景是苏联作为一个超级大国的解体,以及同时出现的一大批社会

① Kenneth Waltz,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Wiley, 1979.

② [英]赫德利·布尔《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第 2 版),张小明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5—17 页。

③ 对此,印度学者桑杰·查图维迪(Sanjay Chaturvedi)和英国学者乔伊·佩因特(Joe Painter)认为其脱离了空间概念,而难以很好地展现“世界”的内涵。Sanjay Chaturvedi and Joe Painter, “Whose World, Whose Order? Spatiality, Geopolitics and the Limits of the World Order Concept,”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Vol. 42, No. 4, 2007, pp. 375-395.

④ Henry Kissinger, *World Order*, New York: Penguin Press, 2014, p. 9.

⑤ United Nations, Resolution adopted by the General Assembly 3201 (S-VI), Declaration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a New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May 1, 1974.

主义国家从计划经济向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过渡,并逐步融入西方市场体系。第三次在2008年金融危机至今,其背景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崛起、二十国集团(G20)等新的全球治理机制的成立,以及新一轮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改革进程的启动。相比而言,2008年金融危机后关于世界经济秩序的讨论最为深刻,并触及现有世界经济秩序的核心基础。归纳起来,这些讨论主要集中在新兴经济体经济崛起引起的实力对比变化、^①国际经济机制改革和规则重构,^②以及对自由市场经济理念的深刻反思。^③上述热点议题,为理解世界经济秩序的内涵与要素提供了现实素材。

基于以上分析,世界经济秩序可以界定为在世界经济领域基于一定的实力结构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国际行为规则和制度体系。它既是一种状态,也是一个演进过程。相比以往,不难发现,当今时代的世界经济秩序的一个突出特征在于其对规则和制度约束的依赖性和敏感性表现更甚。尽管制度与实力之间并非呈简单的线性关系,尤其是在实力对比变动之初,两者往往不相匹配,但它仍不能脱离实力基础。对于实力结构的考察,国家行为体相对于非国家行为体所拥有的主导地位仍难以撼动,这也是现实世界的客观反映。同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制度的非中性特点,绝大多数国际规则和制度都难以在价值上保持中立。世界秩序的价值理念深嵌于国际规则和制度体系之中,既与之共存,又自成体系。由此,这一界定从国家之间的经济实力结构、国际经济规则体系及经济治理价值理念方面,为分析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秩序提供了较为清晰的轮廓。

二、经济实力结构的双层调整与分化

金融危机后,国际经济实力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并且这种变化并非表现

① 例如,Andrew F. Cooper and Agata Antkiewicz, eds., *Emerging Powers in Global Governance: Lessons from the Heiligendamm Process*, Waterloo: Wilfrid Laurier University Press, 2008; Alan S. Alexandroff and Andrew F. Cooper, eds., *Rising States, Rising Institutions: Challenges for Global Governance*,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10; 谷源洋《新兴经济体崛起及世界格局变动》,《亚非纵横》2010年第1期。

② 例如,Debra P. Steger, ed., *Redesigning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Waterloo: Wilfrid Laurier University Press, 2010, Part 1; John J. Kirton, et al., eds., *Making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Effective: Hard and Soft Law Institutions in a Crowded World*, Aldershot: Ashgate Publishing, 2010; John Williams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Reform: A Specific Set of Proposals*, Ox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forthcoming.

③ 例如,Joseph E. Stiglitz, *Freefall: America, Free Markets, and the Sinking of the World Economy*,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10.

在单一层次上。这不仅表现在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整体上实现了对发达经济体经济总量的超越并由此带来两者整体实力对比的巨大变化,还表现在两大群体内部的经济分化日益显著,由此导致了南北经济实力结构与竞合关系的深刻调整。^①

(一) 世界经济的“双速增长”与经济实力对比的变化

2000 年以来,世界经济增长的一个总体特征是,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经济保持“双速增长”,并且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对发达经济体的赶超态势趋于稳定。在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中,不仅中国、印度等新兴大国的高速经济增长令人瞩目,那些曾经深陷“债务危机”的拉美国家和一些经济发展落后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也以崭新姿态出现在世界经济舞台。此外,前苏联东欧地区的多数经济体也实现了政治转型之后的经济振兴。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数据,2000—2014 年,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实现了 6.0% 的年均增长率,高出同期发达经济体年均增长率 4.2 个百分点,其中在金融危机后的 2008—2014 年间,尽管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增速有所放缓,年均增长率下降至 5.3%,但与同期发达经济体的年均经济增长率相比,却高出 4.5 个百分点。^② 在 2000 年前的同样历史时段,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的年均经济增速仅高出发达经济体 0.6 个百分点(见图 1)。

随着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经济的快速增长,世界经济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方向发展。并且,在金融危机后,无论从整体还是从国别来看,发展中国家经济总量都实现了对发达经济体的超越。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数据,2000 年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规模为 20.91 万亿国际元,占发达经济体的比例为 74.3%,较 1980 年提高 17.8 个百分点;2008 年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规模达到 41.97 万亿国际元,实现了对发达经济体经济总量的首次超越;预计 2020 年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的国内生产总值规模将达到发达经济体的 1.55 倍(见图 2)。从国别来看,以中美两国为

①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也出现了分化,一些国家仍保持较好的经济表现,而另一些国家则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经济复苏低迷,甚至出现了负增长。但从世界经济秩序发展演变的动因来看,起主要作用的因素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实力对比变化,故下文的分析主要集中在于此。

② 这里年均增长率的计算方法为各年度经济增长率的简单平均值,下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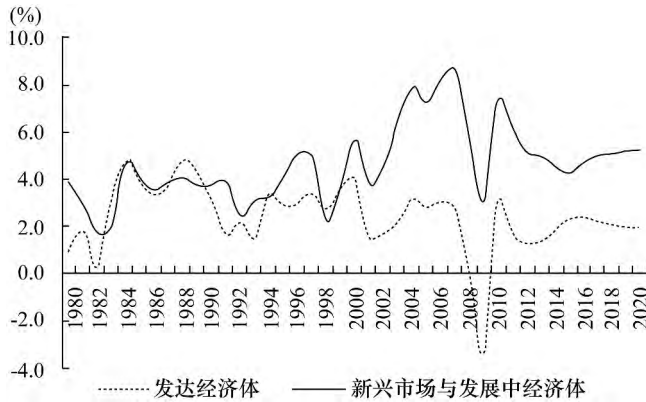


图1 1980—2020 年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率变化

注: 2015—2020 年数据为预测值。

资料来源: 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April 2015。

例 2014 年中国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规模达到 17.62 万亿国际元, 超过美国 1984 亿国际元, 从而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尽管发展中国家按照市场汇率计算的经济总量表现稍逊, 但总体赶超态势也是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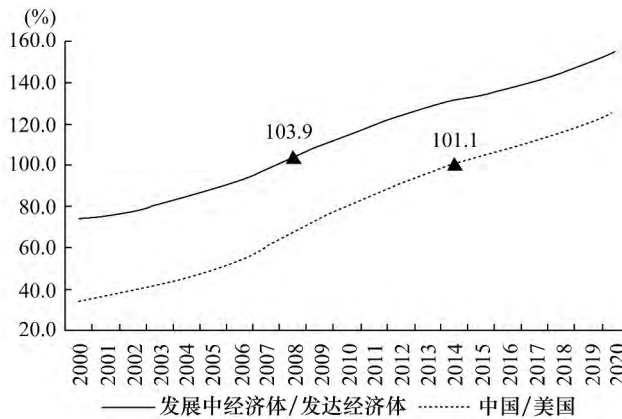


图2 2000—2020 年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总量对比

注: 图中所示为按 PPP 计算的 GDP 规模之比, 2015—2020 年数据为预测值。

资料来源: 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April 2015。

(二) 美欧日等主要发达经济体经济的分化

2008 年金融危机前, 美国、欧元区和日本的经济增速虽不同步, 但在不同

年度的增长表现各有千秋。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经济体经济遭受重创,一度陷入严重的经济衰退,发达经济体的整体经济实力迅速下降。然而,这次危机对发达经济体的影响并非仅限于此。经过金融危机后的调整,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复苏呈现“不均衡”态势,主要经济体经济的增速分化,并且增长格局趋于稳定化,经济实力日益悬殊。具体来说,美国经济复苏逐步巩固,保持了良好增长态势,而欧元区和日本的经济复苏动力相比美国明显不足。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数据,近年美国经济增长速度相比欧元区和日本表现出明显优势,2010—2014 年间实现年均 2.2% 的经济增长率。相比之下,欧元区和日本的经济增速波动较大,并且均在金融危机之后出现过二次衰退(见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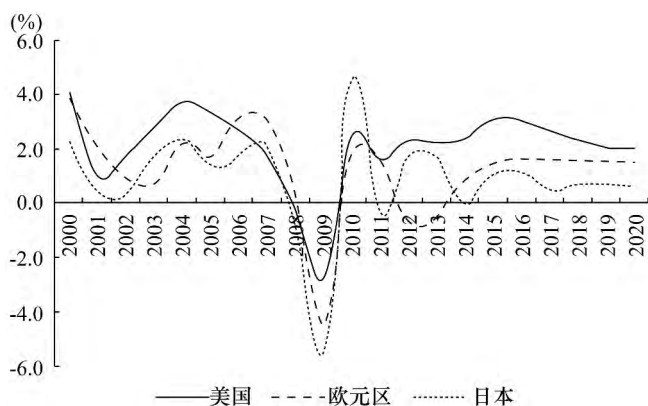


图 3 2000—2020 年主要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率变化

注: 2015—2020 年数据为预测值。

资料来源: 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April 2015。

与此相适应,金融危机也对美国与欧元区、日本的经济总量对比产生了重大影响。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数据,2008 年欧元区经济体按市场汇率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规模为 14.12 万亿美元,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规模的 95.9%,较 2000 年提高了 32.9 个百分点;2012 年这一比例降至 76.9%;预计到 2020 年,这一比例将继续降至 63.0%。与此同时,日本与美国的经济总量对比总体上也呈现下降趋势。2008 年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规模为 4.85 万亿美元,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规模的 32.9%,较 2000 年下降 13.1 个百分点;2014 年这一比例降至 26.5%,预计 2020 年将继续降至 21.9%(见图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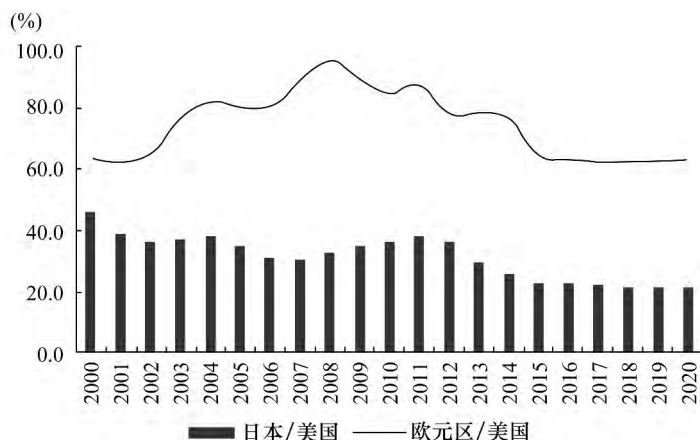


图4 2000—2020年欧元区经济体、日本与美国的经济总量对比

注: 图中所示为按市场汇率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规模之比, 2015—2020年数据为预测值。

资料来源: 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April 2015。

(三) 南北经济关系的深刻调整

世界经济格局的“双层分化”^①带来了南北经济关系的深刻调整。这些调整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 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的合作呈现新的形势。随着形势的发展, 发达经济体不得不开始调整其全球或区域战略, 转而寻求借助新兴经济体的力量来解决自身和全球问题, 并由此推动了南北经济关系和全球经济治理框架的大调整。其中一个突出的案例是二十国集团合作机制的建立。作为一种全球经济协调机制, 七国集团(G7)或八国集团(G8)已无法应对危机对发达经济体和全球经济带来的巨大冲击和破坏, 发挥新兴大国在解决和治理全球经济金融问题中的作用变得日益迫切。为此, 2008年11月, 全球20个主要经济体在华盛顿举行首次峰会, 共同建立了二十国集团这一全球经济治理的长效对话与合作机制。2009年9月, 在匹兹堡峰会上,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发表宣言确定二十国集团代替七国集团/八国集团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首要磋商平台。^②这一宣言正式宣告了新兴经济体在当前全球经济和政治力量对比中的变化, 承认了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秩序构建方面的重要作用。

^① 这里的“双层分化”是指在全球层面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长保持双速运行的同时, 两大群体内各经济体的经济增速也出现了分化。

^② G20, Leaders' Statement, the Pittsburgh Summit, September 24-25, 2009.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对话机制的建立,进一步扩大了新兴经济体的发言权,使新兴经济体的地位得到明显提高,同时也在实质上更好地体现和维护了新兴经济体的利益。二十国集团的成立、升级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替代七国集团/八国集团发挥主导作用,反映了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日益朝着更具代表性的方向发展。^①

另一方面,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协调难度加大,并在很多领域对新兴经济体秉持的合作态度与立场出现分歧。在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上,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分歧日盛,其中欧洲和日本非常规扩张性货币政策与美国货币政策调整方向背道而驰即可见一斑。在美国量化宽松(QE)货币政策即将结束之际,欧元区和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却继续实施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在对外经济政策的协调上,主要发达经济体也难以达成一致。这可以从西方国家制裁俄罗斯的态度和执行力度上反映出来。2014年3月以来,美欧等主要西方国家启动了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行动。但自制裁伊始,美欧即表现出明显分歧,美国主张加大制裁力度,而英国、法国、德国等与俄罗斯贸易关系较为紧密的欧洲国家对全面制裁措施则持谨慎态度。由于西方国家内部经济发展格局的变化,各国的利益需求也随之出现分化,并且在重塑世界经济秩序方面的立场也不尽相同。关于欧美关系,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势是,在分别陷入各种问题和危机的时候,各自都在世界上寻求自己强大的新伙伴(如中国),这将自然而然导致美欧传统伙伴关系的弱化。^②例如,在是否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的问题上,西方国家分成了两派。截至2015年4月底,在5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中,发达经济体占据16席,其中4个七国集团成员和一半的欧盟成员已成为意向创始成员国。一些西方国家不顾美日等国的劝导,陆续申请加入由新兴经济体倡导建立的新的国际经济机构,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西方国家在完善和重构国际金融秩序方面不再是铁板一块。

三、规则体系的变革及其博弈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但其表现形式并非一成不变。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经济全球化的特征与内容

^① Sir Richard Jolly, "Future Directions for the G20: Towards Legitimacy and Universality," in Thomas Fues and Peter Wolff, eds., *G20 and Global Development: How Can the New Summit Architecture Promote Pro-poor Growth and Sustainability?* Bonn: German Development Institute, 2010, pp. 32-35.

^② 庞中英《关于未来世界秩序的几个关键问题》,《国际观察》2009年第5期,第1—8页。

发生改变。此前的全球化主要是以自由市场为基础,而现在乃至将来则可能是一种在升级版规则基础上的全球化。事实上,金融危机后的国际社会所进行的一系列变革正是重新确定全球化规则的一种表现,日益凸显的“再全球化”进程已成为未来世界秩序的发展趋势。^① 值得注意的是,国际规则是非中性的。规则非中性对世界经济秩序的影响,谁能够制定国际规则,谁就能发挥主导作用,从而能够获得更大的利益。^② 因此,世界各国尤其是大国在重建世界经济秩序上的博弈,重点在于规则的制定,并以此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下面将分析金融危机后国际制度(规则)体系变化所呈现的新趋势。

(一) 规则与制度变迁的双轮驱动

随着经济实力的持续提升及更加深刻地融入世界经济,新兴经济体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旧有的世界经济秩序的制度基础主要是由发达国家主导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现在,新兴经济体参与规则制定的诉求日益增加,而且参与规则制定的能力也在不断提升。新兴经济体既有诉求又有能力,在参与甚至是主导未来规则的制定方面所起到的作用自然会有所提升。近年来,新兴经济体在国际经济事务中越来越注重彼此之间的团结合作和立场协调,并建立了相应的协调机制。例如,包括巴西、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南非在内的金砖国家机制,以及印度、巴西和南非建立的三国对话论坛(IBSA)等。在这些机制框架内,新兴经济体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倡议,以推动现有国际经济金融体系的改革与完善。以货币金融合作为例,金砖国家之间的双边和多边制度建构既为现有体系提供了有益补充,也为现有体系的改革提供了激励(见下页表)。此外,作为最大的新兴经济体,中国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及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也将为新的国际经济规则体系提出新的元素。^③ 由此可见,新兴经济体对世界经济秩序变革的驱动作用正在凸显。但是也应该看到,由于国际经济秩序与合作机制正进入一种多层次并存、功能性细分的时期,任何新机制的产生并不意味着旧机制注定灭亡,新机制与“旧”机制仍需要和平共处、互补有无。^④

① 张宇燕《再全球化浪潮正在涌来》,《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1期,第1页。

② 李向阳《国际经济秩序的发展方向》,《现代国际关系》2014年第7期,第20—23页。

③ 冯维江《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当代亚太》2014年第6期,第73—98页。

④ 陈凤英《新兴经济体与21世纪国际经济秩序变迁》,《外交评论》2011年第3期,第1—15页。

表 金砖国家货币金融合作

序号	领域	主要举措
1	银行间合作与货币互换	签署《“金砖四国”银行合作机制备忘录》、《金砖国家银行合作机制金融合作框架协议》、《中国人民银行与巴西央行双边本币互换协议》
2	本币结算与贷款业务	签署《金砖国家银行合作机制多边本币授信总协议》、《多边信用证保兑服务协议》、《可持续发展合作和联合融资多边协议》、《非洲基础设施联合融资多边协议》
3	开发性金融	筹建新的开发银行(NDB)
4	危机救助	筹建应急外汇储备库
5	资本市场合作	成立金砖国家交易所联盟,签署《中国人民银行代理南非储备银行投资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的代理投资协议》
6	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改革	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改革,落实 2010 年的治理和份额改革方案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外交部网站资料整理。

更应该注意到的是 相比新兴经济体 ,发达经济体在经济规则制定方面拥有更多优势。这一方面表现在发达经济体拥有制定规则的丰富经验 ,另一方面也表现在发达经济体拥有更多的资源和能力维护并改造现有的世界经济体系。从现实来看 ,金融危机后发达经济体变革现有国际经济规则体系的动力更强 ,并已切实为之付出诸多努力。尽管现有国际制度体系是由发达国家主导建立的 ,但是随着条件的变化 ,一大批新兴经济体成为这一体系部分规则的受益者 ,并成功实现了经济崛起。为了应对新兴经济体的崛起 ,发达国家理所当然成为了国际经济秩序变革的直接推动力量。金融危机爆发后不久 ,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约翰·伊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 就提出要通过维护和建立新的规则和制度体系将中国等新兴大国的权力约束其中 ,从而确保国际秩序及美国主导地位的延续性。^① 2009 年 11 月 ,美国宣布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 谈判并推动于次年 3 月启动首轮谈判 ,便是这一目标的具体实践。“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的议题远多于传统的贸易协定谈判 ,其核心内容在于如何建立一个“面向 21 世纪的高标准、全面的自由贸易协定” ,并制定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扩大到亚太地区所有国家的长远目标。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曾直言不讳地指出 ,具有高标准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

^① G. John Ikenberry,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 Can the Liberal System Survive?” *Foreign Affairs* , Vol. 87 , No. 1 , 2008 , pp. 23-37.

定”将成为未来各种协议的基准和样板,其目的在于塑造下一代的全球贸易规则。^①此后,美欧推动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谈判的启动亦是这一努力的具体反映。由此可见,面对国际经济力量格局的变化,美国力图重获主动,继续掌握全球经贸规则的顶层设计。^②

(二) 规则与制度变革的共识与分歧

金融危机深刻暴露了现有国际经济治理规则体系的诸多弊端与不足。无论是新兴经济体还是发达经济体,都充分意识到改革现有国际经济治理机制的必要性。这既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多边国际经济机构的改革,也包括对不同领域的现有国际经济规则的改造和更新。同时,为了更大限度地寻求理解与共识,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的主要代表共同组建了二十国集团对话与合作机制。在二十国集团框架下,两类国家对于重建世界经济秩序共同付出了诸多努力。在国际金融机构改革问题上,二十国集团成员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份额及投票权改革达成一致,以便更好地发挥一些有活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作用;在推动国际贸易和投资合作、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方面,二十国集团成员同意抵制在商品和服务领域提高或增加壁垒,反对增加出口限制和违反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刺激出口;在信息技术和网络治理等新的议题方面,二十国集团成员积极推动新的协定谈判,制定新的规则。这些改革共识为建立新的经济秩序创造了条件。

但是,由于在现有国际经济体系中的不同身份,两类经济体的利益诉求和行动目标难以一致。作为世界经济旧秩序的既得利益者,发达经济体享有最大份额的收益。作为世界经济旧秩序的被动接受者,新兴经济体往往被排除在国际规则的制定过程之外。作为世界经济新秩序的推动力量之一,发达经济体的目的在于尽可能地利用现行国际规则保护其既得利益以及制定新的规则获得新的收益。作为世界经济新秩序的推动力量之一,新兴经济体的目的在于尽可能获得与自身实力和责任相适应的权力和利益。由于存在这些具有根本性意义的分歧,在一些具体领域,两者对于改革的力度、进度和范围的认识不尽一致,行动也因此不尽相同。例如在贸易领域,发达经济体的改革愿意甚至更加强烈。究其原因,是因为发达经济体在贸易领域的一些优势逐步被

^① Hillary Rodham Clinton, “America’s Pacific Century,” Speech to the East-West Center, Honolulu, November 10, 2011.

^② 傅梦孜《当前国际经济秩序的演变趋势》,《现代国际关系》2014年第7期,第22—23页。

新兴经济体所取代。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数据,2013 年中国货物贸易总额达到 4.16 万亿美元,超过美国 2503 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①这使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日益感到来自新兴经济体的压力。为此,发达经济体主张对以自由贸易为基础的现行国际贸易规则进行修正和升级,倡导以“竞争中立”原则为基础的所谓公平贸易,即通过提高标准约束新兴经济体的贸易扩张;新兴经济体则在总体上主张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的多边贸易进程,希望现行国际贸易规则的变革服务于已经达成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及便利化目标。在货币金融领域,新兴经济体反对少数国家主导世界金融秩序,迫切要求改革国际金融机构的治理结构,增加新兴经济体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发达经济体对此则持谨慎态度,部分国家甚至极力阻挠实施已达成的改革方案。

(三) 规则与制度变革的领域与议题导向

近年来,国际经济实力结构的变化除了体现在国家层面,即通常所说的新兴国家的崛起,还体现在领域层面,即综合实力最强的国家并非在各个领域都占据绝对优势。这增加了国家之间博弈的复杂性。从包括传统领域和新兴领域的综合视角来看,不同经济体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存在较大差异,议题主导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未来国际规则的演变方向。

在国际货币金融领域,美国的主导地位在短期内难以撼动。与其他领域相比,国际金融体系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那就是它存在显著的锁定效应。所谓锁定效应,意即国际金融体系一旦建立,改变它的难度很大,并且它对国家实力变动的敏感性较低。例如,美国在 20 世纪末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其取代英国的金融霸主地位则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经历了大约半个世纪的时间。当然,其中的原因多种多样,但至少也表明国际金融规则的变化难度相对较大,从货币金融上反映一国综合实力变化所经历的时间也相对较长。目前,美元在国际货币储备体系及贸易计价和结算体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与作用。尽管日元、欧元等其他发达经济体的货币已经实现了国际化,人民币、印度卢比等新兴经济体货币的国际化进程也在不断推进,但在可预见的未来,它们都难以取代美元。^②同时,美国发达的金融体系、较强的防

① WTO Secretariat, *International Trade Statistics 2014*, October 2014.

② 李巍《制衡美元的政治基础:经济崛起国应对美国货币霸权》,《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 年第 5 期,第 97—119 页。

范和应对金融风险的能力,都是其他经济体目前难以超越的。这或许也是当前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改革进展缓慢的原因之一。

在贸易投资领域,中国的主导作用日益凸显。继2013年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大货物贸易国之后,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的报告显示,2014年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达到1280亿美元,成为全球最大的外商直接投资目的地,并且全球外商直接投资的长期发展趋势正从发达经济体转向发展中经济体。^① 这些变化至少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中国参与的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的重要性提升。例如,尽管中国推进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初步确定的贸易投资规则较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的标准要低,但它很可能为世界上更多的贸易份额所接受。另一方面,中国是否遵从发达经济体制定的贸易投资规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些规则的效用。此外,中国可以直接与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就贸易投资规则展开谈判,表达自身诉求。^②

在气候变化领域,欧盟发挥了积极作用。自从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签订以来,气候变化与环境治理问题日益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各国在气候变化相关规则制定及新能源经济技术方面展开的竞争对未来世界经济秩序的影响日益加大。欧盟在气候变化领域担任领导者角色有其历史和现实原因。长期以来,欧盟严重依赖海外能源进口,因而拥有能源供应的危机感,同时欧盟在20世纪70年代能源危机后逐步形成了能源经济和技术方面的优势。^③ 此外,气候变化领域领导权的缺位为欧盟为增加自身凝聚力和集体荣誉提供了机遇。近年来,欧盟利用在气候变化领域的优势地位,将气候变化规则融入贸易议题,影响了国际规则的发展方向。例如,2011年5月,欧盟宣布从2012年1月起将航空业正式纳入欧盟碳排放交易系统,这实质上是对航空业征收碳关税,并将由此导致全球贸易规则的新一轮博弈。

① UNCTAD, *Global Investment Trends Monitor*, No. 18, 29 January 2015.

② 2008年中美启动双边投资协定谈判,2015年3月中美投资协定已基本完成投资协定文本谈判;2012年5月,中日韩三国签署《关于促进、便利和保护投资的协定》,并于2014年5月生效;2013年11月,中国与欧盟正式启动投资协定谈判。

③ 谢来辉《为什么欧盟积极领导应对气候变化》,《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8期,第72—91页。

四、社会问题与治理理念的转变诉求

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和恢复经济秩序,全球层面的经济治理成为国际经济合作与协调的优先议程。一直以来,对于全球性和区域性经济组织及各国政府而言,全球经济治理的目标主要集中在解决日益凸显的全球性经济问题,从而维护世界经济的稳定与繁荣。这其中,促进经济增长又成为这一议程的首要目标之一。因此,为了有效地推动这些目标的实现,效率原则常常排在经济治理理念的优先位置。随着对金融危机反思的深入,人们越发感到植根于当今世界经济发展与治理体系的价值理念存在难以掩盖的问题,尤其是建立在“华盛顿共识”基础上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非西方国家的崛起,不仅关乎经济与政治权力,而且还关乎观念与模式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①

(一) 金融危机的社会效应

金融危机后,经济问题与社会问题的联动关系强化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变化和特征之一。作为金融危机的后遗症,经济增长乏力、债务危机升级、失业率居高不下、收入差距扩大困扰了主要发达经济体,并且这些经济问题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社会矛盾与动荡频现,英美便是首当其冲。

2010 年以来,英国多次出现学生抗议、工厂罢工、工会游行,并于 2011 年爆发了最近数十年来最严重的骚乱。尽管这次骚乱的起因是一名被伦敦警察厅警务人员枪杀的 29 岁黑人男子的亲友发起的一场和平示威活动,但随着大量对政府和社会不满的民众加入其中,和平示威很快演变成为一场暴力活动。其后,骚乱向曼彻斯特、索尔福德、西布罗米奇、伍尔弗汉普顿等地扩散,给英国经济带来了严重负面影响。仅从经济损失来说,据伦敦市长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宣称,骚乱造成的损失约为 1.33 亿英镑,并且骚乱期间伦敦警方支出高达 7400 万英镑,伦敦以外地区的警力支出超过 5000 万英镑。^②在参加骚乱的人员中,青年占据多数,其中仅未满 18 周岁的青少年就占据了被逮捕人员的 1/5 强。经济不景气、失业率高及政府削减开支给社会福利带来

^① Nancy Birdsall and Francis Fukuyama, "The Post-Washington Consensus: Development after the Crisis," *Foreign Affairs*, Vol. 90, No. 2, 2011, pp. 45-53.

^② Sandra Laville, et al., "England Riots to Cost Taxpayers at Least £133m in Policing and Compensation," *The Guardian*, September 6, 2011.

负面影响等经济因素成为年轻人对政府产生对抗情绪和骚乱不断蔓延的主要原因。

紧随其后,2011年9月,美国上千名示威者聚集纽约曼哈顿,发起“占领华尔街”运动,反对美国政治的权钱交易及社会分配不公,并试图占领华尔街。在此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占领华尔街”不断升级,并逐步扩散到华盛顿、洛杉矶、旧金山、丹佛、芝加哥、波士顿等数百个城市,从而演变成为席卷全美的群众性社会运动。这些抗议反映出美国民众在反对金融腐败和缺少金融监管、经济不平等和贫富分化、社会不公、失业、剥夺民众权利、钱权政体、警察暴行、对外战争、环境污染和资本主义制度虚伪性等方面的诉求。^①由此可见,在深层次上,“占领华尔街”折射出来的深层次问题是美国社会财富分配不均加剧,贫富鸿沟加深,富裕阶层成为救助金融体系和经济刺激措施等政策的主要获益者。^②与此同时,“占领华尔街”抗议活动还迅速向其他发达国家扩散。英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多个国家的上千座城市的民众均先后发起不同程度的抗议行动,反对各国政府在应对经济危机、解决经济与社会问题上的不作为。

欧洲多国的青年骚乱,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向全球蔓延等社会问题的不断显现,正是当今世界经济与社会问题相互影响并且联系日益密切的重要表现。尽管这些骚乱已经平息,社会已经暂时稳定,但金融危机对社会稳定带来的负面影响仍然没有消退。它不仅影响了各国政策运用的价值导向,也引发了人们对重建经济与社会关系的深入思考。毫无疑问,跨越国界的金融危机、经济低迷和社会动荡,增加了人们对经济自由主义的质疑。^③

(二) 收入不平等与经济治理的危机

一系列的社会动荡表明,在当今世界各国面临的诸多社会问题中,收入和财富不均已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2014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在该组织的一次会议上宣称,世界上最富有的85人所拥有的财富相当于世界最贫困的35亿人的财富之和,这令人不得

① 谭扬芳《从“占领华尔街”运动的100条标语口号看美国民众的十大诉求》,《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2年第5期,第68—72页。

② 周琪、沈鹏《“占领华尔街”运动再思考》,《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9期,第83页。

③ 江涌《金融资本主义正在穷尽其存在的一切理由:从“占领华尔街”示威活动谈起》,《红旗文稿》2011年第20期,第4页。

不感叹在激励和再分配之间难以找到平衡点。^①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的一项分析显示,个人财富超过 100 万美元的人数占世界成年人口总数的比例为 0.7%,其拥有的财富占世界的份额为 44%;个人财富为 10 万—100 万美元的人口占世界成年人口总数的比例为 7.9%,其拥有的财富占世界的份额为 41.3%。这表明世界最富的 8.6% 的成年人口拥有世界 85.3% 的财富。而个人财富在 1000 美元以下的成年人口占世界人口总数的比例为 69.8%,其拥有的财富占世界的份额为 2.9%。^②

关于收入不平等产生的原因及后果,一些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解释。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指出资本持有者与普通民众的贫富差距扩大及阶层固化问题。他认为,由于资本收益率大于产出增长率,企业家的财富积累速度因此要高于产出和工资增长,并且这一趋势还在持续,这使得普通工人阶层难以进入上层社会,而社会各阶层流动及代际流动的降低不仅导致社会活力下降,还会加大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③ 皮凯蒂著作的流行及对于这些分析的争论,揭示了全球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对于收入差距拉大等公平问题的高度关注,公平与效率再次成为全球范围内无论是研究者还是决策者都共同关注的重要课题。^④ 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则分析了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之间的收入不平衡。他指出,1990—2008 年,美国非贸易部门人均收入增加值从 7.2 万美元增加到 8 万多美元,而贸易部门则从 7.9 万美元增加到 12 万美元,前者增长约 12%,而后者增长接近 52%。由于美国新增就业绝大部分来自非贸易部门,因而收入分配在两部门之间日益分化。^⑤ 从经济学上看,不平等不仅仅是一个社会问题,由于它抑制了总需求,也会对整个经济带来损害。^⑥ 那种以减少政府干预、促进贸易和金融自由化为主要内容的发展和治理模式,无视经济与社会之间的互动联系,让危机后的秩序重建变得更加困难,同时也为国家资

① “Panel Debates Moves to Spur Growth, Create Jobs,” *IMF Survey*, October 2014.

② 个人财富指的是扣除负债的金融与非金融资产。“Credit Suisse, 2014,” *The Economist*, October 18–24, 2014, p. 85.

③ [法]托马斯·皮凯蒂《21 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4 年版。

④ 巴曙松《在新的全球环境下重新思考财富分配:主持翻译〈21 世纪资本论〉中文版的一点思考》,《国际经济评论》2014 年第 6 期,第 33—34 页。

⑤ Michael Spence, “The Impact of Globalization on Income and Employment: The Downside of Integrating Markets,” *Foreign Affairs*, Vol. 90, No. 4, 2011, pp. 28–41.

⑥ Joseph E. Stiglitz, *The Great Divide: Unequal Societies and What We Can Do About Them*,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15.

本主义的发展与兴盛提供了更多空间。

(三) 关于自由市场经济的反思

2008 年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秩序带来的重大影响, 还在于它对世界经济发展和治理理念带来冲击。20 世纪 70 年代, 西方国家经济“滞胀”使得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受挫, 以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货币主义、供给学派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理论开始复兴。这些理论的核心内容包括反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 强调自由市场机制, 支持私有化和反对政府主导及干预生产活动, 支持自由贸易和资本的自由流动等。^① 金融危机爆发和蔓延却清楚地显示, 市场的自动稳定机制是有限的, 各类金融机构的内部治理远没有人们想象或希望的那么完美, 仅靠市场力量无法避免金融危机。这也引起各国学者纷纷开始反思自由市场经济的利弊, 重新审视对市场进行干预的必要性。

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R. Krugman) 指出, 美国主张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保守主义运动”对美国经济、社会和政治带来了诸多不良影响, 他主张政府应发挥好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公正的作用。^② 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 十分明确地指出, 本次危机暴露了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严重缺陷, 这一观念认为不受约束的市场能够带来效率和稳定, 同时它坚信市场能够自行调节, 这在本质上就自相矛盾; 而世界经济的失序, 也与某些国际经济机构曾将这些观念置于首位不无关系。^③ 美国圣母大学研究经济思想史的历史学家菲利普·米罗斯基(Philip Mirowski) 认为, 虽然对尊崇自由市场原则的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并未触及其内核, 从而导致新自由主义在危机后仍得以大行其道, 但这些研究为理解新自由主义学说及深刻反思当前国内和国际经济治理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基础。^④

总之, 从全球环境来看, 金融危机暴露了全球资本主义经济金融体系的深层次问题与弊端, 因而全球经济治理的核心问题不仅仅是促进增长和创造财富, 财富与收入的分配也应该成为世界经济秩序赖以维系的重要支柱。这意

① David Harvey,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② Paul Krugman, *The Conscience of a Liberal*, New York &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2009.

③ Joseph E. Stiglitz, *The Stiglitz Report: Reforming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and Financial Systems in the Wake of the Global Crisis*,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10.

④ Philip Mirowski, *Never Let a Serious Crisis Go to Waste: How Neoliberalism Survived the Financial Melt-down*, London & New York: Verso, 2014.

意味着国际社会需对经济治理目标与理念加以改变,从而在新的经济环境下影响政府的对内与对外政策措施,以重建新的秩序。

结 论

关于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秩序,影响其发展演进的因素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现有体系中各经济体的经济实力,它是一种物质上的力量,在其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二是规则和制度的力量,它涉及贸易投资、货币金融、经济发展等各个领域;三是价值理念,它反映的是市场与政府,民族国家与国际规则、制度之间的关系。当前世界经济秩序发生的变化,从现实情况来看,主要是反映在物质、实体经济层面的变化,以及以此为基础带来的国际规则的适应性调整。从长远来看,一些趋势已初露端倪,并必将带来实力、规则和理念的系统性改变。

首先,世界各国的经济实力对比关系在金融危机后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些变化一方面表现在新兴经济体整体经济实力的提升,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另一方面则表现在两类经济体内部的实力分化,从而将进一步塑造中美两国在经济上的核心地位。由此带来的后果是,世界经济实力结构变动在第一层级核心国家中的“极化”现象与第二层级国家的“平板化”现象同步发展,两类国家划分的现实意义也将因此而减弱。有学者预言在未来不到十年的时间内,世界将迎来中美两个超级大国并由此形成两极结构体系。^①即便如此,那时的两极结构也将与冷战时代的美苏两极不可同日而语。从目前发展的形势来看,类似美苏阵营般严格的层级结构将难以再现,取而代之的更可能是一个包含两个超级大国的网状关系格局,至少在经济上其他主要行为体不再依靠“选边站”来获得生存。

其次,世界各国变革全球经济治理规则与制度的动力在金融危机后有所增加,规则和制度变迁在世界经济秩序重建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各国经济相互依存的加深,世界范围内逐步形成了规范和监督各国经济行为的全球规则与制度,并且这些规则和制度的改革与完善均是在应对全球化带来的各种风险、挑战与危机的过程中完成的。金融危机深刻暴露了现行机制的缺陷与不足,这使改革国际规则与制度体系成为共识,各国

^① 阎学通《历史的惯性:未来十年的中国与世界》,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

围绕规则制定所展开的博弈将继续成为世界经济秩序演进的重要变量。但是,由于主要经济体在推动改革方面拥有不同的身份、利益和能力,诸如通过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主导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应对战后失序这种“一揽子”方案来解决危机后的经济失序几乎变得不再可能,权力将在各种议题和领域出现分化,并由此带来在规则制定方面更加复杂的博弈关系。

最后,金融危机暴露了自由市场经济的局限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世界经济秩序重建的理念调整。在资本主义世界内部,一些社会矛盾与问题的激化,并不仅仅是相互割裂的群体性事件,而是反映出以新自由主义理念构筑的世界经济体系日益失去曾经支撑和维系它的现实基础。正如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教授阿米塔夫·阿查亚(Amitav Acharya)所认为的那样,尽管美国的单极地位仍可能继续,但“美式世界秩序”,也即是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的霸权秩序的适用范围日益有限,并且对外部世界也日益没有其支持者设想的那样保持一贯的友善。^①此外,这也在某种意义上反映出个体或者社会群体对于改造世界经济治理理念上的努力,以及政府经济治理政策日益展现出来的社会关怀。

总之,金融危机后的种种迹象表明,当前的世界经济秩序已进入一个深度调整和变化期。尽管经济实力与秩序变化的不同步性仍十分显著,但秩序的演进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各种力量对比变化的趋向,并且维持霸权秩序的层级结构的成本日益增加,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在其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与此同时,秩序的重建将以规则与制度变迁为基础,而规则与制度的改革与创新将是一个各方力量围绕不同领域和议题进行不断博弈的过程。此外,世界经济秩序的社会效应不断显现,从而催生人们对原有治理理念的质疑与反思,并对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治理理念的忠诚发生变化,这将对未来世界经济秩序的发展带来深远影响。综合来看,世界经济秩序的转型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当前离世界经济秩序的根本性变革还为时尚早。

^① Amitav Acharya, *The End of American World Order*, Cambridge & Malden: Polity Press, 2014, pp. 1-11.

pan , and ASEAN is reshaping the East Asian order. The biggest challenge in establishing this order is that the four forces are engaged in a new game and will be unlikely to reach a consensus on the future objective. They have more and more different considerations on the regional stability and prosperity. Against this background , China should fully realize the effects of its rise in the region , improve the Chinese discourse on East Asian community , promote the top-level design of establishing regional institutions , devote itself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n open East Asian community based upon common interests , develop an East Asian community of common interests and responsibilities through institutionalized cooperation , make great efforts to realize an East Asian community of a shared future , and cultivate an equal , cooperative , mutually beneficial , and open East Asian order that is based on common interests.

The Diffusion of the Five Principles of Peaceful

Co-Existence *Yuan Zhengqing and Song Xiaoqin* (66)

The diffusion of international norms is an important topic in the disciplin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estern theories tend to emphasize the top-down instruction at the international level and learning at the state level , and empirical studies focus on the diffusion of Western norms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Consequently , the role of non-Western countries is neglected in the process of norm diffusion. The diffusion of the Five Principles of Peaceful Coexistence offers an excellent opportunity to examine the behaviors of non-Western countries. The Five Principles proposed by China was neither imposed forcibly upon other countries nor intended to educate others in a condescending manner with a so-called “civilized ” standard. Instead , the Five Principles started to diffuse in the process of equal interactions with the neighboring countries of similar experiences in history. Gradually , it embedded itself into more international meetings and treaties through establishing diplomatic relations , convening international meetings , participating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offering foreign aid and expanded from ideologically similar countries into ideologically divergent ones.

The World Economic Order in the Post-Financial Crisis

Era: Economic Power , International Rules , and
Governance Philosophy *Xu Xiujun* (82)

The shock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has brought about the disorder of world

economy and a series of adjustments ensued. The crisis , however , cannot remake a new order by itself. The remaking of the world economic order hinges upon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 of relative economic power ,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ules , and economic governance philosophies. After the financial crisis , the relative economic power between emerging and advanced economies and among themselves has exhibited a dual-level differentiation , and South-North economic relationship has become more diversified. The competition for rule-making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fierce among world countries , especially among the major powers , but the difficulty in dominating agenda-setting accelerates the emergence of a non-centered world economy. The status of liberal market economy as the core developmental and governance philosophy is gradually declining. In short , the world economic order is entering into a period of deep adjustment and change , but it is still far from achieving a fundamental transformation

ARTICLES

The Origin of the Cooperation of the BRICs: A Theoretical Explanation *Ren Lin and Yin Jiwu* (102)

The BRICs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latforms for China to strengthen developing countries' discursive power and rule-making capacity in global governance. As for the origin of the BRICs cooperation , exogenous functional factors include systemic external environment , power structure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 an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 while exogenous normative factors include reward culture of repeated cooperation and desire to improve international norms. But , on the other hand , endogenous functional factors include the number of actors , complementarity , and domestic politics , while endogenous normative factors include the recognition of homogeneity and emergent consensus. The BRICs judgments on maintaining the reward structure and on their future impact are the two mechanisms to connect the factors mentioned above. The origin of the BRICs cooperation stemmed from their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ise as well as the non-neutrality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mong the BRICs , as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gradually increases , their consensus about the pursuit of international status and